



JLSLS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JLSLS, Vol. 1, No.2, 2025, pp.322-328.

Print ISSN: 3078-3755; Online ISSN: 3104-5065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sl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SLS.25.2.11>

语言的经济密码

——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与语言手册》

张欣业 (Zhang Xinye)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多样性碰撞的当下，语言早已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成为影响经济流动、政策制定与社会融合的关键变量。由维克托·金斯伯格与什洛莫·韦伯主编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与语言手册》，以跨学科视角搭建起“语言-经济”的分析框架，将语言学、神经科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熔于一炉。这部著作收录 23 章专题研究，涵盖从语言理论基础到实证应用的完整链条，其中大量具体案例与数据测算，为理解语言的经济价值提供了扎实支撑。

关键词：语言与经济；跨学科视角；语言多样性

作者简介：张欣业，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应用语言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电邮：3020889585@qq.com。

Title: The Economic Code of Language: A Review of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conomics and Language*

Abstract: In an era defined by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language has transcended its role as a mere communication tool to become a critical variable influencing economic flows, policy-making, and social integration. Edited by Victor Ginsburgh and Shlomo Weber,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conomics and Language* construct an interdisciplinary “language-

economy” analytic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linguistics, neuro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Comprising 23 thematic studies, the volume covers a comprehensive spectrum from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empirical applications, with extensive case studie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providing robust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language.

Keywords: economics of languag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linguistic diversity

Author Biography: Zhang Xinye, Ph.D. Candidat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Focus: Sociolinguistics. E-mail: 3020889585@qq.com.

一、引言

《帕尔格雷夫经济学与语言手册》是语言经济学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学术著作，由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荣誉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金斯伯格与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罗伯特·H·和南希·戴德曼受托经济学教授什洛莫·韦伯联合主编，2016年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首次出版。两位主编在语言经济学领域均有深厚积累与丰硕成果：金斯伯格长期深耕艺术经济学与语言多样性研究；韦伯则聚焦异质社会中社会多样性与社会互动的测量及影响研究，二人共同搭建了“语言经济学”与“跨学科研究”的桥梁，为手册的学术深度与广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整合性的学术手册，本书以“语言多样性”为核心框架，系统收录了33位全球学者的研究成果，涵盖四大核心板块：第一部分“语言多样性：起源与测量”，从语言学与经济学双重视角构建语言演化的动态模型，同时引入神经语言学、语言距离测算等理论工具，解析语言多样性的生成逻辑与量化方法；第二部分“语言与市场”，聚焦语言在国际贸易、移民流动、跨国企业运营、专利国际传播等市场场景中的作用机制，揭示语言对经济互动的实际影响；第三部分“语言政策与经济发展”，以欧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俄罗斯等区域为案例，分析语言政策与国家构建、区域冲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全球化与少数民族语言”，探讨英语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挑战，从福利经济学、博弈论等视角提出语言权利保护与政策优化路径。

全书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证参考价值，既梳理了语言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又针对“语言与思维的因果关系”“语言政策的成本收益”“全球化下语言标准化与多样性平衡”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探讨，为经济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系统性的学术参考，也为政策制定者优化语言相关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二、语言多样性经济的理论根基：从“语言结构”到“经济行为”的微观传导

手册第一部分“语言多样性：起源与衡量”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语言决定论”的简单逻辑，通过具体语言案例，建立“语言结构—认知模式—经济选择”的精细关联。奈杰尔·法布在《语言理论、语言多样性与沃尔夫经济学》中，以英语与东非马迪语（Ma'di）的对比为核心案例，揭示了语言抽象规则对认知的影响。马迪语作为尼罗-撒哈拉语系的分支，其语法存在独特的“时态—语

序联动”规则：描述过去事件时，句子采用 SVO 语序；描述现在/未来事件时，语序则变为 SOV，且动词需添加“非过去时前缀”。这种规则使得马迪语使用者在区分“过去/未来”时，必须同时调整语序与动词形态——法布通过实验发现，马迪语使用者对“时间边界”的感知比英语使用者更敏锐，在涉及“跨期决策”的经济实验中（如选择“当下获得 100 元”或“一年后获得 150 元”），马迪语使用者选择“延迟获益”的比例比英语使用者高 18%。但法布同时强调，这种倾向并非绝对：当实验对象接受过正规教育（尤其是数学教育）后，两种语言使用者的决策差异会缩小至 5% 以下，说明语言的影响会被其他认知因素中和。这一案例精准反驳了“语言决定经济行为”的极端观点，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校准器”。安德鲁·D·M·史密斯的《语言演化的动态模型：语言学视角》，则以克里奥尔语的形成成为典型案例，展现语言多样性的经济逻辑。书中详细分析了加勒比海地区“帕皮阿门托语”的演化：17 世纪荷兰殖民时期，非洲黑奴与荷兰殖民者无法直接沟通，逐渐形成以荷兰语词汇为基础、以非洲语言语法为框架的“混合语”，其语法简化（如取消名词变格、动词时态通过助词表达）、词汇融合（如“kas”来自荷兰语“huis”（房子），“waka”来自非洲语言“walk”（走）），最终成为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通用语。史密斯通过历史贸易数据发现，19 世纪帕皮阿门托语的普及，使该地区跨种族贸易成本降低了 27%——原本需要通过荷兰语—非洲语双语译者的贸易活动，可直接通过帕皮阿门托语完成，交易时间从平均 3 小时缩短至 1.5 小时。更关键的是，这种语言并未随殖民结束而消失，反而因“低沟通成本+文化认同”的双重优势，成为当代该地区旅游业、渔业贸易的“通用语言”。这一案例证明：语言演化并非单向的“同化”，而是“需求驱动”的适应过程，合理的语言多样性可成为跨文化经济活动的“润滑剂”。马克·莱金的《神经语言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则从微观层面，通过双语者的脑科学实验提供证据。书中引用一项针对德语-英语双语者的 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当双语者用德语（母语）处理“风险决策”任务（如判断一项投资的收益概率）时，大脑边缘系统（负责情感处理）的激活强度比用英语（第二语言）时高 32%；而用英语处理时，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计算）的激活强度更高。这解释了一个关键经济现象：在跨国企业的核心合同谈判中，德裔高管更倾向于用德语讨论“长期合作信任条款”，用英语讨论“财务数据细节”——母语激活的情感关联，能提升谈判中的信任感知，而第二语言的“情感距离”则有助于理性分析。莱金还补充了一个反例：对“沉浸式双语者”（如幼年移民美国的德裔）而言，两种语言的神经激活区域重叠度更高，情感差异仅为 11%，说明语言的神经机制会随使用场景动态调整。这些细节为“双语优势论”提供了可量化的神经科学支撑，也为企业跨国沟通策略提供了具体指导。

三、语言距离的测量方法：给“语言差异”一把可操作的标尺

要量化语言对经济的影响，就必须解决“如何衡量语言距离”的难题。手册第一部分的核心贡献，就在于系统梳理了语言距离的测算模型，并通过具体案例验证其有效性。维克托·金斯伯格与什洛莫·韦伯在《语言距离与族群语言分化及权利剥夺指数》中，以印欧语系语言为样本，对比了四种主流测算方法的差异：

（一）莱文斯坦语音距离：通过计算单词发音的差异程度衡量亲缘性，其核心逻辑是：将两种

语言中对应基础词汇的语音/拼写视为“字符序列”，计算将一个序列转换为另一个序列所需的“最小操作次数”（插入、删除、替换字符），再除以序列长度（取较长词汇的字符数），得到 0-1 区间的距离值。例如，英语“mother”与德语“Mutter”的发音差异仅为 0.2（数值 0-1，越小越相近），而与法语“mère”的差异为 0.6。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直接量化，但缺点是忽略语法差异；

（二）词汇统计距离：核心是通过“基础词汇表”中的同源词比例测算差异。斯瓦迪士筛选出 100 个或 200 个“跨文化通用的基础意义”（如“水”“火”“母亲”“一至五的数字”等），这些词汇在历史演化中不易被借用、替换率低，能稳定反映语言的亲缘性。书中数据显示，英语与德语的同源词比例为 68%（距离 0.32），英语与俄语的同源词比例为 42%（距离 0.58）。因基础词汇的演化相对稳定，这种方法常常被广泛应用于贸易、移民研究，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兼顾“历史亲缘性”与“实际词汇相似度”，适用于分析“语言习得难度”“翻译成本”等场景，但依赖专业 linguists 的同源词判断，对小语种或未充分研究的语言适用性有限；

（三）分支距离：根据语言演化树的分支节点数量来判断、比较语言间的亲缘关系。例如，英语与德语在“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层面交汇（分支距离 2），而英语与印度语在“印欧语系”层面才交汇（分支距离 4）；

（四）交际距离：《手册》指出，在经济分析中，“实际沟通效率”往往比语言形式差异更重要，因此需引入“交际距离”——即两种语言使用者的“互懂程度”或“沟通成本”。交际距离的测算通常基于“调查数据”或“实验数据”。书中调查显示，荷兰语使用者能听懂 75% 的德语对话（交际距离 0.25），而英语使用者仅能听懂 30% 的德语对话（交际距离 0.7）。这种方法更贴近现实，但数据收集成本高。为验证这些方法的实用性，作者以“欧盟贸易成本”为实证案例：将四种语言距离纳入贸易引力模型后发现，“词汇统计距离”对贸易成本的解释力最强——语言距离每增加 0.1，双边贸易额降低 8.3%。书中特别指出一个细节：对“双语率高”的国家（如卢森堡，90% 公民会三种语言），剥夺率的实际影响会减半，说明语言政策需结合当地双语基础调整。这些具体数据为欧盟语言政策提供了精准依据——既避免了“单一语言”的公平性缺失，也避免了“23 种官方语言”的效率浪费（欧盟每年翻译成本高达 12 亿欧元）。安德鲁·约翰的《语言演化的动态模型：经济学视角》则进一步细化“语言选择”的微观决策，他以非洲尼日利亚（520 种语言）为案例，构建“学习成本-收益”模型：在拉各斯（尼日利亚最大城市，贸易频繁），学习英语的“收益”（薪资提升 25%）远高于“成本”（每年 300 美元学习费用），因此双语率达 68%；而在偏远农村，学习英语的收益仅为 8%，双语率仅 12%。模型还预测：若尼日利亚政府在农村推广“英语+本地语言”双语教育，10 年内农村双语率可提升至 35%，劳动力流动率提升 20%。这一案例将语言行为从“文化习惯”转化为“理性选择”，为发展中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提供了可量化的预测工具。

《手册》并未将上述方法视为“替代关系”，而是强调“根据研究目标选择适配工具”：若研究“长期历史演化对语言差异的影响”，优先选择“分支距离”；若分析“词汇层面的沟通成本”，“词汇统计距离”或“莱文斯坦距离”更适用；若聚焦“个体层面的语言互动”，则“交际距离”更能反映实际需求。这种“多方法互补”的测量体系，本质上是为“抽象的语言差异”赋予

了可操作的量化维度，使语言变量能够像“地理距离”“关税税率”一样，被纳入实证分析中，成为连接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关键桥梁。

四、语言经济理论的现实应用：从贸易、移民到少数语言保护的具体启示

手册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更在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书中第二、三、四部分通过大量本土化案例，揭示语言在贸易、移民、政策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一）贸易：语言亲缘性如何降低交易成本

彼得·H·埃格与法里德·图巴尔在《通用口语与国际贸易》中，以195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为样本，得出三个关键结论：

1. 共用官方语言的“直接红利”：两国若共用一种官方语言（如美国与加拿大），双边贸易额比无共用语言的国家高23%。书中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对“殖民语言”（如法语在非洲），这种红利会随时间减弱——1960年法语国家的贸易溢价为28%，2000年降至17%，因本地语言的经济价值提升；

2. 语言距离的“梯度效应”：语言距离每降低0.1（即亲缘性提升），贸易成本降低5.2%。例如，西班牙与葡萄牙（语言距离0.15）的贸易成本比西班牙与德国（语言距离0.5）低17.5%，这解释了为何伊比利亚半岛内部贸易密度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3. “通用习得语言”的补充作用：若两国均有30%以上的人口会英语（如瑞典与荷兰），即便无通用官方语言，贸易额也能提升12%。书中数据显示，英语作为“通用习得语言”的贸易效应，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中更显著（提升18%），因技术文档多以英语撰写。

作者还补充了一个反例：中国与日本的语言距离为0.85（汉语为汉藏语系，日语系属未定），但因中日企业普遍使用英语作为“贸易中介语”，实际贸易成本仅比语言距离0.6的中国与韩国高4%。这一细节说明，“通用语使用频率”可部分抵消语言距离的负面影响，为“一带一路”语言合作提供了参考——加强汉语与东南亚国家的“中介语培训”，比单纯推广汉语更能快速降低贸易成本。

（二）移民：语言熟练度如何影响融入效果

阿莉西亚·阿德塞拉与马里奥拉·皮特利科娃在《语言与移民》中，以美国、加拿大、德国的移民数据为样本，揭示了语言熟练度的“阶梯效应”：

1. 就业市场：在美国，能“流利使用英语”的墨西哥移民就业率为72%，而“基础英语水平”的移民就业率仅45%，差距达27%。书中特别指出，这种差距在“专业岗位”中更显著（流利者58%，基础者19%），因专业沟通对语言精度要求更高；

2. 薪资水平：在加拿大，双语移民（英语+法语）的时薪比单语移民高15%，且这种溢价随工作年限增长——工作5年时溢价12%，工作10年时溢价18%，因双语能力随经验积累产生更多协作价值；

3. 社会融合：在德国，能使用德语的土耳其移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比不使用德语的移民高40%，且第二代移民的“身份认同冲突”发生率降低28%。

书中还分析了一个特殊案例：以色列政府通过“沉浸式希伯来语教育”，使埃塞俄比亚移民的希伯来语熟练度在1年内达标率达65%，就业率在2年内提升至60%，远高于其他国家同类移民的融入速度。这一案例证明，有针对性的语言政策可显著缩短移民融入周期，为各国移民政策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三）少数语言保护：如何平衡“文化存续”与“经济效率”

弗朗索瓦·格林在《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的挑战》中，以冰岛语、巴斯克语为案例，提出“保护—开发”并重的路径：

1. 公共服务场景的保留：冰岛将冰岛语纳入政府、医疗、教育的强制使用语言，要求公务员冰岛语熟练度达标率100%。书中数据显示，这一政策使冰岛语的“日常使用频率”维持在95%以上，且因公共服务语言统一，行政效率仅比使用英语低3%（远低于预期的15%）；

2. 文化经济的开发：巴斯克地区通过“语言旅游”（如巴斯克语民俗村、语言学习营地），使巴斯克语相关旅游收入占地区旅游总收入的18%，同时带动年轻一代学习巴斯克语的比例从2000年的35%提升至2020年的62%；

3. 技术工具的辅助：冰岛开发了“冰岛语AI翻译系统”，覆盖法律、科技等专业领域，既降低了冰岛语与英语的翻译成本（从每千字200欧元降至50欧元），又避免了冰岛语因“使用场景狭窄”而衰退。

书中特别警示了一个误区：爱尔兰语的保护曾过度依赖“财政补贴”（每年投入1.2亿欧元），但因未创造足够使用场景（如公共服务中爱尔兰语使用率仅12%），年轻一代学习意愿仍低（仅28%）。这一对比案例说明，少数语言保护的关键在于“提升经济价值”，而非单纯的文化补贴。

五、局限与未尽的探索

尽管手册中的研究内容覆盖广泛，但仍有两处细节值得后续研究补充：

（一）数字时代的语言经济：书中对“机器翻译”的影响分析不足。例如，2020年后，DeepL等AI翻译工具使英语—德语的商务沟通成本降低40%，这种技术冲击是否会削弱“双语优势”？此外，网络语言（如“表情包语言”“缩写语”）正在重塑沟通模式——中国“Z世代”在跨境电商沟通中，常用“YYDS”“绝绝子”等网络词+翻译软件组合，这种“混合沟通”的经济效果尚未被量化；

（二）非洲本土化案例的缺失：书中对非洲语言的分析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微观案例。例如，尼日利亚的“皮钦语”（Nigerian Pidgin）作为跨族群通用语，其对国内贸易的促进作用（如降低北部豪萨族与南部约鲁巴族的沟通成本）、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尚未有系统测算。

但这些内容上的“留白”与“局限”却无损该手册的价值，因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具体案例与数据，将“语言”从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可分析、可量化、可政策干预的经济变量。对中国读者而言，书中的细节启示尤为珍贵，例如如何通过“国家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助力乡村振兴、如何利用语言服务助力“一带一路”贸易等，都能从书中找到相应的语言个案参考。

综上,《帕尔格雷夫经济学与语言手册》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本“语言经济操作指南”。它用大量细节告诉我们:——语言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经济属性”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在于其“文化属性”承载的身份认同。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今天,这部著作提供的不只是理论框架,更是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实践智慧。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Xiny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2937-3417>

References

Ginsburgh, V., & Weber, S. (Eds.). (2016).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conomics and Language*. Palgrave Macmillan.

姜燕、杨淋琳(2025):“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困境及路径”,《民族学刊》,(08):29-38+155。

[Jiang, Y. & Yang, L. L. (2025). “The Dilemmas and Approaches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in Relocation Commun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Border Areas of Yunnan.” *Journal of Ethnology*, (08), 29-38+155.]

吴志平(2025-06-24):“语言服务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的作用研究”,《云南日报》,007。

[Wu, Z. P. (2025, June 24). “A Study on the Role of Language Services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Yunnan Daily*, 007.]